

简明
中国古代文化史



前 言

中国古代文化是悠久的，同时也是光辉灿烂的，它既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历史存在的见证，又是现代文化的基础，中国古代文化史便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产生、发展、演变及其规律和特点的一门学科。

目前，学术界对于“文化”的含义尚有多种不同的理解。不过中国古代文献中所提到的文化则多指“文治教化”而言。所谓“文治教化”，用今天的话来说，大致包括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所取的正是这种含义。显然，中国古代文化史同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等都有一定的联系，但又不是同一回事。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化史还是能够联接多种学科，并使之构成一定的知识网络，从而加深对中国古代社会认识的一种具有综合性特点的学科。

中国古代文化是丰富多采的，以致任何这方面的著作都很难反映它的全貌。限于篇幅，也为了便于教学，本书只能选取一些中国古代文化的最基本的方面来加以介绍和论述。全书共分十三章，除第一章从宏观上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起源与特点进行把握外，其余十二章均按不同的文化领域来进行介绍。在论述过程中，也尽量做到紧扣本题，不枝不蔓，以便读者能对中国古代文化有一种较为全面而又简明具体的认识。书中所涉及到的具体内容有天

文、历法、地理及行政区划、职官、科举、姓名称呼、婚姻、宗法、饮食、服饰以及经学和宗教等。为使读者能有一种纵贯性的印象，对上述内容的介绍，基本上是依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来进行的。对于某些学术上尚有争议的问题，除择善而从外，亦颇不乏著者的一得之愚。至于不当之处，则只好请专家和读者诸君指正了。

中国古代文化的来源同中华民族的来源一样，都是多元一统的。这种多元一统既与中国幅员的广大以及气候物产等自生条件的差异有关，同时也与历史上各民族的文化互相融合，并最终融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文化是分不开的。当然，任何文化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社会生产力。中国古代文化的状况，也与中国古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基本是一致的。但中国文化的这种一统性即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体意识之一经形成，又会产生出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并一直延续于后世。历史上，中华民族虽经历了无数次的灾难，中国的国土曾多次被异族所入侵，但中国文化既没有被淹没，也没有发生变异，其原因即在于此。即使是中华儿女被分居世界各地，中华文化的传统也仍然被顽强地遵守着，今日世界许多城市的唐人街便是明证。

中国古代文化的主体虽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特色，但古代文化中的某些方面，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又适应了不同时代的要求。由于历史的不断前进，原先的一些文化成分自然很难再适应后世的要求了。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现象。应该说，精华与糟粕的区分，既有时代的要求，也有阶级的标准。我们要继承传统文化，当然应该继承其中的精华部分。但何谓精华，何谓糟粕，即在今日也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本书的编著者虽在有关的章节中谈了自己的意见，也只是提供读者参考，并无强加于人之意。好在我们大家的目的一致，即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清理与批判继承，以发扬我们民族的优

良传统，激发爱国主义感情，增强民族自信心，从而为建设新时代的精神文明作出贡献。

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对所参考的古代文献及当代论著，限于篇幅及“简明”的体例，有些未能一一注明。在此特向当代的有关著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而且，由于时间的短促和编著者的学识所限，书中的疏漏和错误也一定难免，敬祈读者和使用本教材的学校能够提出宝贵意见。

最后，还要感谢甘肃人民出版社的李果、潘萍二同志，正是他们的鼓励和辛勤工作，本书才得以在短时间内付梓。

作者

1994年7月15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文化的来源与特点	(1)
第一节 多元一统的中国古代文化	(1)
第二节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点	(11)
第二章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	(21)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概况	(21)
第二节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基本知识	(24)
第三节 中国古代的宇宙理论	(32)
第三章 中国古代的历法	(38)
第一节 日、月、年	(38)
第二节 阴历、阳历、阴阳历	(40)
第三节 四时与节气	(42)
第四节 中国古代的记时法	(46)
第四章 中国古代的地理学与行政区划	(58)
第一节 中国古代地理学概况	(58)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	(69)
第五章 中国古代的职官制度	(82)
第一节 中央官制	(82)
第二节 地方官制	(103)
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	(108)
第一节 周代的乡举里选与战国的养士	(108)

第二节	汉代的察举与征辟	(109)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	(111)
第四节	隋唐科举制的确立	(112)
第五节	宋元科举制的发展	(115)
第六节	明清科举制的鼎盛	(118)
第七章	古人的姓名和称呼	(127)
第一节	姓氏	(127)
第二节	名字	(133)
第三节	古人的号	(137)
第八章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	(146)
第一节	婚姻的概念及其意义	(146)
第二节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概况	(149)
第三节	媵妾制	(155)
第四节	聘娶制	(163)
第九章	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	(169)
第一节	中国宗法制度的发端	(169)
第二节	中国宗法制度的确立	(170)
第三节	中国宗法制度的主要内容	(172)
第四节	中国宗法制度的演变	(181)
第十章	古人的饮食	(184)
第一节	粮食	(184)
第二节	肉食	(192)
第三节	蔬菜与果品	(199)
第四节	饮料与调料	(200)
第五节	古人的饮食习惯	(203)
第十一章	古人的衣饰	(205)
第一节	头衣	(205)
第二节	体衣	(211)

第三节	足衣·····	(217)
第四节	古人的佩饰·····	(220)
第十二章	中国古代的经学·····	(223)
第一节	经与经学·····	(223)
第二节	经书概说·····	(232)
第三节	经学的演变·····	(244)
第十三章	中国古代的宗教·····	(257)
第一节	佛教·····	(257)
第二节	道教·····	(268)

第一章 中国古代文化的来源与特点

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含义似有着多种不同的理解。但概括起来，不外有三：一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二是指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及思想、信仰、风习、艺术等；三是指与政治、经济并列的一种形态，并由此又派生出一种更狭小的含义，即指识字与学习。中国古代文献中所提到的“文化”，多指“文治教化”而言，与上述第二义略同。如汉刘向《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又，《文选》载晋束皙《补亡诗·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唐李善注：“辑，和也。言以文化辑和于内，用武德加于外远也。”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所取的当然也只能是这种含义。本章便先从中国古代文化的来源与特点两个方面入手，作一宏观的考察。

第一节 多元一统的中国古代文化

中国古代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但最终又是归于一统的，即融为以华夏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这无论从考古发现、古史传说还是从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信史中都可以得到证明。

一、考古学与古人类学所揭示的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一统性

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在肯定中国是土生土长的一点上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摇篮并非一个。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非止一处。

早在旧石器时代，当中国人还处在原始群的时代起，中国大地上的猿人（直立人）就已经有多处的分布了。1965年5月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的“元谋人”，便是距今170万年左右的中国最早的人类。元谋猿人已经能够制造和使用石器，并学会了用火。元谋猿人化石（两颗上中门齿）及其文化遗物（刮削器及炭屑等）的发现，对探索我国早期猿人的体质特征及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再联系到1980年在云南禄丰县所发现的距今约800万年的腊玛古猿头骨化石，还可以推断，中国西南地区当是人类起源和早期人类演化的中心地区之一。

1963至1964年间在陕西省蓝田县发现的“蓝田人”，也属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化石，距今约五、六十万年。从已发现的头盖骨、颌骨及牙齿来看，其形态特征较北京猿人为原始。“北京人”亦称“中国猿人”，是1927年首次在北京西南龙骨山洞穴内发现的，距今约四、五十万年。第一个头盖骨于1929年12月发现，此后又陆续发现40个以上的个体。北京人以石器和骨器为主要工具，并能用火，以狩猎为生。

此外，分布于中国大地上的早期智人（又称古人），则有金牛山人（辽宁营口市金牛山）、丁村人（山西襄汾县丁村）、大荔人（陕西大荔县）、马坝人（广东曲江县马坝）等，他们距今约10万年至4万年。而距今约4万年至1万年的晚期智人（又称新人），也有多处发现，如山顶洞人（周口店山顶洞）、峙峪人（山西朔县峙峪）、河套人（内蒙乌审旗的黄河沿）、柳江人（广西柳江

通天岩）、左镇人（台湾省台南县左镇）等。

上述旧石器时代猿人、古人、新人在中国大地上的分布之广泛，足以说明中国人在起源上的多元性。然而他们又都表现出了一种共同的特征，即蒙古人种（黄种）的形态与特征，如铲形门齿以及以刮削器为主的工具组合等，这又雄辩地说明了他们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居民。而由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即是土生土长的中华文化。在这一点上来说，又是一统的。

到了距今8000年至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华文化的这种多元一统的特征便表现得更加明显。首先是黄河流域文化，这包括以仰韶文化（1921年首先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为代表的黄河中游文化，以大汶口文化（1959年首次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和龙山文化（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为代表的黄河下游文化，以马家窑文化（1923年首次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为代表的黄河上游文化，以及以大地湾文化（1983年首次发现于甘肃秦安大地湾）为代表的前仰韶文化等。其次是长江流域文化，又包括以河姆渡文化（1973年首次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良渚文化（1936年首次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为代表的长江下游文化和以大溪文化（四川巫山大溪）、屈家岭文化（1954年首次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为代表的长江中游文化等。再次是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燕辽文化。红山文化1935年首次发现于辽宁赤峰红山，1986年又在辽宁西部东山嘴、牛河梁发现了红山文化的祭坛和“女神庙”，以及陶质裸女像、玉猪龙等，这标志着红山文化也已达到了很高的文明程度。此外，在珠江流域、河西走廊以至青藏高原，都有新石器文化遗存的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其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例如在距今5000年左右，仰韶文化在黄河中游曾突然衰落，而龙山文化在这一代的影响则明显扩大，甚至播及到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这即反映了龙山

和仰韶两种文化的迭合与交融。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也有许多方面的相同，并且其中的许多文化内容又是商文化的一个来源。屈家岭文化受仰韶文化的影响明显，在某些地区（如豫南鄂北）两者常常交错分布。再如，学术界一般还认为继承河南龙山文化（距今4900—4000年）的是夏文化，而商周甲骨文和青铜文化又均是以黄河中下游的新石器文化为主要源头。凡此，皆可以说明，丰富多彩的中国新石器文化已由多元区域性的发展而逐渐内向和融合，并最终汇聚成了以华夏文化为核心的高度文明的中华文化。

二、远古传说所保存的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一统迹象

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形态是氏族社会。而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又标志着远古的中华大地上曾经有过许许多多创造这些文化的氏族或部落集团。但由于年代的久远以及书写条件的困难，我们今天已无法见到当时的文字资料。不过，神话传说还是流传于后世了。一般认为，原始神话产生于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即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期，也就是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这些传说经代代流传，最后被记录了下来，虽然零乱，而且又被掺进了若干后人的意识，但透过其神话的色彩，还是可以窥见一点古史的真面目。

关于远古部族的划分，近人多根据徐旭生先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的论述，而又稍加调整，将中国远古部落大致分为三大集团，即西北的华夏集团、东方的东夷集团和南方的苗蛮集团。

华夏集团无疑是三集团中最重要的集团，以致此后竟成了中国全族的代称。这一集团主要包括黄帝和炎帝两大氏族，而两族内又各有许多的分支。《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氏取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由于古人常将氏族的名字与个人的名字相

混，故所谓少典“生”炎、黄，正如郭璞所说：“诸言生者，多谓其苗裔，未必是亲所产。”（《山海经·大荒东经》注）大约少典氏和有娇氏是两个世代通婚的氏族（正如后世的姬姓同姜姓一样），而黄帝族和炎帝族便是从他们中间分出来的。倘再上溯，则华夏集团最早很可能发源于昆仑山（青海高原）脚下，此后逐渐东移，而少典和有娇便是他们到达陕、甘交界处时的两个氏族的名称。炎、黄分出后，黄帝族居于陕西北部的黄土高原，因姬水而得姬姓；炎帝族则居于陕甘交界的渭水上游一带，因姜水而得姜姓。此后，这两族都有一部分东移。黄帝族东迁的路线偏北，大约先沿北洛水南下，然后东渡黄河，沿中条山、太行山脉逐渐向东北走去，直到今天的北京附近（即古蓟地）。他们所建立的主要国家有虞、虢、焦、滑、霍、杨、韩、魏、芮、贾等。炎帝族则顺渭水东下，再沿黄河南岸向东，一直发展到豫西南及豫、冀、鲁三省交界的地方。他们所建立的主要国家有申、吕、齐、许等。可以说，在有史以前，华夏集团的炎、黄两族已顺着黄河两岸散布于中国的北方及中部的许多地区了。

东夷集团主要有太昊（皞）、少昊（皞）、蚩尤等部族。太昊风姓，遗墟在陈（河南淮阳），其后人的封地为任（山东济宁市境内）、宿（山东东平县境内）、须句（山东东平县境内）、颛臾（山东费县境内）等。少昊嬴姓，遗墟在鲁，即今山东曲阜，古名穷桑或空桑。蚩尤为古代九黎族首领，其居地在山东西南部。此外，偃姓的皋陶与少昊同属一族，“皋”即“皞”，偃、嬴一声之转。偃姓所建立的国家有英、六、蓼（均在安徽中部）等。夏初的后羿，也属东夷集团中的少昊氏族，寒浞灭羿后仍居羿地，今山东潍坊市的寒亭，即寒浞墓之所在。还有己姓的莒，亦为少昊之后，最早姓嬴，后改。至于秦、赵祖先蜚廉的“蜚”，当与费国的“费”字同字异形。费亦嬴姓，建国很早，后灭于周初，地在今山东费县境内。殷末，蜚廉的子孙西行建立了秦、赵。还

有郟，国在今山东郟城县境内，亦为少昊之后。可见，东夷集团所分布的地域，北自山东北部，最盛时曾达到山东全境，西至豫东，南至豫西南和安徽中部，东至海。

苗蛮集团主要是分布于湘、鄂、赣一带的三苗。在楚人入主这一带之前，他们是这里的先住部落。古代传说中，尧、舜、禹都曾有过“伐三苗”之事，后来，三苗便被迫迁到了西北和西南的边地一带。除此之外，《尚书·尧典》中提到的尧的部下驩兜，也有人认为当是南方的一个部族，并与苗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属华夏集团的祝融，后来也同苗蛮集团密不可分。至于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一带的百越，也有人说应划入南蛮集团。

上述三大部落集团经过长期的交往和斗争，终于融成了华夏族，即汉族的前身。其大致的过程，先是黄帝、炎帝联合起来打败九黎，杀其首领蚩尤（涿鹿之战）；随后，黄帝又三战而打败炎帝（阪泉之战），遂成为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此后尧、舜、禹相继禅让，实际上又反映了黄帝族与东夷各部族间的斗争。直至禹的儿子启所建立的夏朝，在其初期仍同东夷族有过反复的较量。至于苗蛮集团的三苗，虽其族已迁到了边远地区，但他们的文化影响还是部分地留在了原地，并与此后的楚文化相融合。春秋、战国时期，以“蛮夷”自居的荆楚，还同中原各国有过多次的争斗，直到秦汉的统一，南楚文化与中原文化才最后融为一体。

三、古代史籍所记载的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一统事实

从历史记载来看，中国历史上最早建立的王朝是夏、商、周，而它们又分别有着不同的来源和文化传统。

夏的祖先是禹。据孟子说，“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史记·六国年表》《集解》引皇甫谧说）《尚书·尧典》也说：“夏，中

国也。始自西夷，及于内地。”再联系到《史记·匈奴列传》所说的“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的话，以及夏的属国昆武、室韦等均为北方少数民族的事实，所以有人就认为夏人即胡人，亦即匈奴人。不过从考古调查来看，夏兴起于以嵩山为中心的颍水上游及伊洛平原，最后又达于晋南一带，当是没有问题的。学术界一般也都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便是典型的夏文化。又据《史记·夏本纪》载，夏自禹至桀，共传十七世，历471年。夏的国都，最早禹居阳城（今河南登封嵩山以南），后居阳翟（今河南禹县），至太康时居斟郟。斟郟或谓即今偃师二里头夏墟遗址，该遗址内已发现有宫殿、陵寝、房屋、道路、水井及各种作坊等。“夏”义训为“大”。《论衡·正说》：“夏者，大也。”《方言》：“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夏”又与“厦”通，有“广居”之义。是所谓夏人，即居住高房大屋之人也。这不但已为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所证明，而且也显示出，夏的文明程度在当时来说已是很高的了。《史记·夏本纪》还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而后世中国的历法，在月建上所采用的也主要是夏正。这说明夏的天文历算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夏代还曾有过大规模的治水活动，据说《尚书·禹贡》便是“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的结果。这样说来，则夏代的地理学及水利学的知识也是非常丰富的。又《尚书·汤誓》所载“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之”两句，也有人认为即是夏代民歌的孑遗。至于夏人居住区的语言被后人尊称为“雅言”，夏人居住区的音乐被后人尊称为“雅乐”，则更可以令人想见夏的文化水平了。

商来源于东方，即山东西部、河南东北部一带，是以鸟为图腾的东夷部落集团中的一支。《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颂·长发》：“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玄鸟即燕子。《史记·殷本纪》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

女，为帝誉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这说明契是商的第一位父系祖先，而契之前，商人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其图腾崇拜对象为玄鸟。至于“帝誉次妃”云云，则是后人附会。据《史记·殷本纪》载，自契至汤，传十四世始代夏桀而有天下。这十四世正相当于夏代，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商朝建立后，又传十七世、三十一王，约六百余年，至纣时遂为周武王所灭。这样前后合计，商已有着上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商的文化已经高度发达了。这无论从史书记载，考古发现，还是甲骨文字的印证，都是可以说明的。商的祖先相土已开始作乘马，王亥开始作服牛，可见，在商朝建立之前，商人就已经学会驯养牛马以作为运载工具了。商的农业和手工业也空前发达。甲骨文中有关禾、黍、稻、麦、稷、粟等字，可以表明当时农作物的品种已经很多；而商代的饮酒之风，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商代粮食的增多。在手工业方面，除了制骨、制玉、石雕、漆器及皮革、纺织、舟船、酿酒外，冶铜技术已经很高，殷墟武官村出土的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重达875公斤，为我国已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器。商代的建筑开始使用木骨架结构，即先在夯土台基上安放柱础，竖立木柱，然后安置梁架，覆盖屋顶，装上门窗。这种建筑方法奠定了我国传统建筑的基本格式。而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分工，商品的生产 and 交换在商代也取得了显著发展，“商人”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当时所使用的货币为“贝”，十贝为一“朋”，《易经》卦、爻辞中讲到经商的时候也经常有“得朋”、“失朋”的记载。我国的汉字发展到商代后期也基本成熟，甲骨卜辞和器物铭文中出现的汉字已达3500多个。《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这说明商人已有了书写的典籍和历史文献。例如《尚书·盘庚》，基本上是一篇珍贵的商代文献。《墨子·非乐》还说殷人“恒舞于宫，酣歌于室”，《史记·殷本纪》也

说帝纣“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可见商代的歌舞也很盛行。

除此之外，商的领土又较夏代有了很大的扩张。《诗经·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可能在相土时商的势力已达到了渤海边。又《商颂·殷武》：“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这说明商朝不但已经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连西方的氐羌也向它臣服了。对西北方的鬼方，商也进行过征伐，商王武丁用了三年时间将鬼方打败。《易·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及《未既·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两段爻辞，便反映了这一段史实。武丁还曾南征，所谓“挾彼殷武，奋发荆楚”（《商颂·殷武》），即是商的后人追述这次战争的诗句。此后，商的势力更伸张到了长江以南的地区。

周人是一个姬姓部落。周的第一位父系祖先名弃，是有邠氏女子姜嫄“践巨人迹”后所生。这说明周人在弃之前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而此后则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周人善于农作，弃也被后代祀为农神后稷。据说弃曾作过夏朝的农官，及夏之衰也，弃的后代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国语·周语上》），遂与羌人相处并世代通婚。此后，周人在与戎狄的斗争中曾多次迁徙，到后稷的十六世孙古公亶父（即太王）时，才定居于岐山之南的周原（陕西岐山县），自称周人，并开始臣服于商。至古公亶父的孙子文王（姬昌），则已成为西方诸侯之长，称为西伯。文王之子武王（姬发）遂联合众诸侯一举灭商，建立周朝，国都镐京（西安市附近），史称西周。自武王至幽王，西周共传十二世。平王东迁洛邑以后，史称东周，东周自平王至赧王，又传二十五世。前后合计，约八百余年。

周代不但社会经济高度发达，而且在“文治教化”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改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例如，按五等爵位分封

诸侯，并实行以嫡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这样便将政治与血缘关系永远纠缠在一起，成为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统治的纽带。再如在经济上所实行的井田制，所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滕文公上》），实即后世之劳役地租，也将人民永远地束缚在土地之上。在意识形态方面，周人不像商人那样迷信，而是比较讲求实际，注重人事。他们所标榜的“敬天保民”，实即后世“天人合一”及民本思想的滥觞。至于周的职官制度、礼乐制度（包括采风之制）、婚丧制度以及衣食住行准则，许多也都为后世所遵从。

但也必须看到，周的文治教化水平虽然很高，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辉煌时代，但却不是凭空出现的，更不是周公一人所制作的。周的文化是在自身传统的基础上，又沿袭或吸取了夏、商文化的有益成分而发展起来的。正如孔子所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周朝建立后，不但将夏、商、周三族复合成为同一民族的雏形即华夏族，而且也将三支来源不同的文化融为一体了。中国文化来源的多元一统性，在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春秋战国时代，华夏同周围的戎狄蛮夷（即四夷或四裔）又继续进行交往、斗争和融合。其时华夏亦称“诸夏”、“诸华”。而所谓“华”，乃指服章之美、文采之盛。其时中原之人自谓其文化高于周围四夷，故常以华夏自居，如孔子就说过“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话。（《左传·定公十年》）与此同时，“中国”之称也普遍了。“中国”一词出现甚早，《尚书·梓材》追述周成王的话曾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大雅·桑柔》：“哀恫中国，具赘卒荒。”不过当时的中国主要是指夏人曾居住过的伊洛平原即“中土”，或是京师之地。到春秋、战国时，“中国”